

# 忆老舍在齐鲁大学

张昆河 口述

李耀曦 撰文

66 年前——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 年）夏天，我考上齐鲁大学国文系。

当时的文理学院院长兼校长是林济青，国文系主任是郝立权（字炳衡），而大学一年级《文学概论》与《文艺批评》两门课的业课教授，就是声名卓著的新文学家舒舍予——老舍。

第一次见先生是暑假期间，在文理学院办公楼二层的院长室里。慕名前来拜访的我吃惊地呆坐着，半天没有说出话来。因为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舒先生，竟只有三十多岁年纪：身材不高，清瘦，梳分头，戴圆片金丝镜，两眼异常有神。他身着一件西式白色纺绸衬衫，举止洒脱，气度不凡。但绝对没有一般留洋归来者那种洋味十足的绅士派头，也不见有何名士风流的逸气，与我想象中那位被称作“《论语》八仙”之一的幽默大师毫无共同之处。

这次谈话，时间不长。先生没有显出多少幽默，似乎也无意谈文学，只是一本正经地向我这个 33 级新生介绍了一番齐鲁大学的院系建制和课程安排。后来，看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：他虽然很喜欢幽默，但对初次见面的人并不太爱讲话，尤其女人。

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有点大喜过望和受宠若惊，以至于路上准备的一肚子话，一点儿也没倒出来；老舍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，也呆呆地大半没有听进去。如今还能清楚记得的，只有最后那句话——就是先生介绍到开课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时，说：“我这是现蒸现卖，讲不好，您哪——凑合着听。”一句地地道道的老北京谦语，幽默而毫无教授架子。



1930 年摄于齐鲁大学

## 二

老舍先生讲课，是坐着的。

后来知道，他有腿病。但讲着讲着，兴致上来，便也站起来，讲得逸兴湍飞时，常有妙语脱出，冷丁袭来，引得哄堂大笑。但先生自己可不笑，始终板着脸，一本正经。

老舍在齐大所开课程，除了一年级的《文学概论》与《文艺批评》外，还有《小说和作法》、《但丁研究》与《莎士比亚研究》（一些回忆文章把后两门合称为《世界名著研究》，但当时，这是两门课。）《小说和作法》是给国文系二年级开的，《但丁研究》与《莎士比亚研究》是三年级的选修课。

先生讲这两门课，并不看讲义，也很少手势，而能挥洒自如，纵横跌宕。虽是浓重的北京口音，但经过了淘洗和净化，没有那种京片子的贫、虚、俗，没有哗众取宠的江湖气。例子多是外国的，课却轻松动听，并不涩奥，颇有熔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味道。

舒先生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是不满的。课堂上亦有言涉时政之辞。但多是反语、冷箭,含沙射影,藏而不露。而同在“国学研究所”后来成为老舍朋友的墨学家栾调甫先生,则常常是不忌生冷,不管是韩复榘,还是蒋介石,皆可拍案大骂。

先生的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课,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。除了我们国文系一年级,其他许多系的也跑来听,文学院教学楼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。这在齐大,实属罕见。因为,当时学生人数很少。一般一门课,必修与选修加在一起,也不过一二十人。譬如,加拿大籍教授、传教士出身的明义士(J. M. Mengies)的甲骨文课,自始至终只有3个学生选听。

当然,这既是先生个人的魅力,也是新文学本身的魅力。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,凡是有些血气的青年,谁不愿意接受新思潮,喜欢新文学呢?这是当时时代的主潮,大潮澎湃任谁人也无可阻挡的。然而,齐鲁大学是美、英、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播宗教而集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。它的文学院国文系的宗旨,是为各教会中学培养国文教员。在老舍、郝立权等先生到来之前,其历届国文系的系主任和多数教员,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、拔贡之类的老夫子,所授课目,皆是尚书、诗经、文选、音韵、训诂一类所谓“旧学”。因此,在齐鲁大学的历史上,文科开讲“新学”,老舍乃是第一人。这在齐大是堪称创举的。

这个创举之功,应归于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和国学研究所主任栾调甫。栾调甫是一位自学出身的墨学大师。梁启超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上,讲到《墨子》部分,曾对这位栾公大书特书,认为他的造诣堪称“石破天惊”,即便不是绝后也为空前。在栾调甫的建议下,1930年林济青去北京先后请来了舒舍予(老舍)、郝立权、余天庥、陈祖炳、谢惠等知名学人,充实到国学研究所和各系任教。来后,舒先生任国学研究所新文学副教授,兼编《齐大月刊》;郝立权任国文系主任;余天庥任社会经济系主任;陈祖炳任物理系主任;谢惠任化学系主任。这样就使文理学院的系主任阵营无论在学历、资格、才能和教学质量上,都前进了一大步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老夫子们滥竽充数、洋传教士独揽“朝政”的局面。同时,也为日后林济青被洋人挤出齐大埋下了伏笔。这自是后话。

### 三

老舍先生开讲新文学,在齐大荡起一股清新之风。影响所及,连那个酷好中国古文化的明义士家里,也摆有老舍题了字的新版长篇小说《离婚》。

当时,无论是《齐大月刊》、《现代》杂志,还是林语堂主办的《论语》半月刊,只要一有先生的文章登出,都会在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中引起一阵骚动;大家争相传阅,先睹为快。再不然,就自己跑到院前东方书社买它一本,带回宿舍,细细阅读,慢慢消受。

读着,读着,我们中间一些人也难耐跃跃欲试之情,便也要组织文学社。记得班上马琳等八九个男女同学,成立了一个“未央社”,常凑到一起,颇为自负地谈诗论文。我也不甘寂寞,参加到一个叫“时代青年”的文学社里去充数。它是校外的,主要成员是当时济南一中的几位年轻语文教师,由刚从北大毕业回来的严薇青主办。那时,卞之琳、李广田等人,也在一中教书。

当时,老舍先生并不给我们开《小说和作法》,但这毫不妨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写的称作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的一类东西,朝他手里塞。每逢下课,先生腋下必会云集起厚厚的一叠“杰作”带回家。下次上课时,又是一摞。

先生宽容大度,和蔼可亲,常于繁忙之中,不惜时间,耐心地看这些习作,坦率地指出不足并给以指导,但他一向要求严格,从不奉送廉价的夸奖。记得有一次,先生在别的班上表扬了马琳写的一篇散文和我的一篇小说,说写得还可以。我闻讯大喜,又送上一些新诗。得到的回答却是:“你这新诗写得可不好,没劲儿(先生主张:新诗要像一团火,语言要有热力)!受旧诗影响太深。”一下子,打消了我想当新诗人的念头。

愈是如此,同学们愈是敬重先生,想方设法与之亲近。

最好的接触机会,莫过于“系会”。所谓“系会”,就是全系师生联欢会。这是一个例会,规定每学期举行两次,一首一尾。会上,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节目,便是老舍先生的京剧清唱和讲笑话。

先生熟悉民间事物,爱好广博,他的笑话,大都精彩不俗。至今,还记得他那个关于票友的笑话:

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,是个票友。此人迷京戏迷得厉害,一心想“下海”成名角儿。可唱得太差,谁听了谁捂耳朵,花钱请也请不来,拉也拉不住。没办法,只好自个儿找了一个清净的地界儿

——跑到西山上去唱。上了装,提把青龙偃月刀,连作带打,唱《单刀赴会》。正唱着唱着,山上下来一个老头儿,打柴的。一看这位,吓懵了:不知是关老爷显圣,还是土匪劫道。赶忙跪下磕头:“好汉爷饶命!好汉爷饶命!”票友一看,心中暗喜,大喝一声:“老头儿休怕!饶尔性命不难,只须——听我一段西皮——免你不死。”便又唱起来。唱着,唱着,老头儿“扑咚”一声又跪下了:“好汉爷,你甭唱了,还是杀了、杀了我吧!”票友惊问:“为何?”老头哭道:“我觉得,还是杀了我——更好受。”

人们哄堂大笑。老舍话锋一转,说,写文章也是这样,光自个儿感觉好不好,还得有读者。我有一个哥哥,就很爱读张恨水的小说,而决不看我写的。杀头也不看。

#### 四

齐鲁大学校北,围子门里南新街54号,是老舍先生结婚后的寓所。那时,我们这些文学迷,曾多次涉足这所幽静的小院——找先生聊文学。

我们与老舍先生交谈,年轻的舒师母胡絮青女士有时也微笑着立在一旁,但并不插话。胡女士约二十五、六岁,梳当时知识女性中流行的齐耳短发,穿短袖旗袍,身材修长,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姿。听说她也是一个旗人,一位画家的女儿,女才子。那时她已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,随先生来济后,在齐鲁中学教国文。曾有一个时期,胡女士在我们班听齐树平先生的《中国美术史》课。才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是舒师母,只见她每次总是腋下挟个硬皮笔记本独往独来,来后便静静地坐到最后一排,并不按齐大“尊重女性”的惯例:女生坐前,男生在后。

老舍先生的寓所不大,却种了不少花草,记得院子里有一眼井,好像还有一株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,在北屋西侧的会客室里,先生向我们谈了对于自己小说的看法。先生说《老张的哲学》虽然你们都愿意看,但太粗糙,不过是抱着幽默死啃。如果现在再写,可三倍于原作。《猫城记》不太成功。对《小坡的生日》、《离婚》还比较满意。

当然,这里有谦虚之词,不可完全看死。谁都知道,老舍在济南的三四年间,写了为数可观的长、短篇小说与诗文,还有一组专门描写济南风土人情的散文。这是先生抗战前的黄金时代,也是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。他逐渐淘洗了前期作品里那类未必需要的插科打诨。他那独具特色的幽默

风格更加成熟,更趋深沉了。

关于幽默,先生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。记得大意是:有人说我很幽默,我不以为荣,也不以为辱。只是觉得自己可笑,别人也可笑,我不比别人高,别人也不比我高。谁都有欠缺,谁都有可笑的地方。有人一定说他是圣人,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,我没这个瘾。我不教训别人,可也不听别人教训。现在想来,这段话很要紧。它于无意中说出了先生幽默感的来由——抱着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阅人阅世,认为人生皆有缺陷,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。既自信又冷静,但并不居高临下,自比圣贤。

它也于无意中透露出先生性格中的一个侧面——没有奴颜和媚骨。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:“狂”和“狷”。《论语》里说:“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先生为人谦逊随和,却又“有所不为”,对于军阀、洋人、权势者一向是不买账的,节骨眼儿上大义凛然。

#### 五

遗憾的是,我们终于没能听到先生的《小说和作法》课。

因为,1934年的夏天,老舍就辞教他适了。有人说,是与校长林济青吵翻后愤而辞教的。老舍与林为何争吵?不甚清楚。

先生离开齐大后,接到青岛大学校长赵太侗的聘书,去了青岛。没想到,1936年赵辞职,林济青又赴青继任青岛大学的校长。老舍不愿与之合作,未接聘书,决然辞教。这段公案,先生生前不愿提及,至今已鲜为人知了。

1937年夏天,老舍先生重返齐大。不久,日本兵临城下。韩复榘的国军炸毁黄河大桥,弃土南走。11月11日晚上,在韩投弹炸桥的爆炸声中,先生毅然决然,弃家独行,奔赴国难。仅携一只小手提箱,怀揣50块钱。冯玉祥先生曾写下一首“丘八”诗,盛赞此举:

老舍先生到武汉,  
提只提箱赴国难;  
妻子儿女全不顾,  
赴汤蹈火为抗战!

.....

从此,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先生。

(责任编辑:牟进)